

PREDICT THE FUTURE BY REVIEWING THE PAST
RECOLLECTION THE SINO-U.S. ECONOMIC RELATIONS IN THE PAST CENTURY

中美关系研究丛书

19



汪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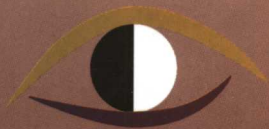
主编

鉴往知来

百年来

中美经济关系的回顾与前瞻

顾云深 石源华 金光耀 主编



本书环绕百年来中美经济关系这个主题，汇集全国各方面的学者长期研究的成果。细心的读者会发现本书有些论文在丰富材料的基础上，剖毫析厘，辨明了是非；有些论文对政治与经济缠绕在一起的历史事件，探索递嬗的轨迹，层层分析，终于使历史还原了本来的面目。

复旦大学出版社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

中美关系研究丛书

汪 熙 主编



鉴 往 知 来

——百年来中美经济关系的回顾与前瞻

主编 顾云深 石源华 金光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鉴往知来:百年来中美经济关系的回顾与前瞻/顾云深
等主编.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10
ISBN 7-309-02389-7

I. 鉴… II. 顾… III. 中美关系:对外经济关系-1900~
1999 IV. F125.5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62879 号

出版发行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200433

86-21-65102941(发行部) 86-21-65642892(编辑部)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经销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印刷 上海新文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3.25

字数 343 千

版次 1999 年 10 月第一版 1999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 000

定价 2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主 编 前 言

“一年一度又春风”。

“中美关系史研究会”第三次年会于1997年5月在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举行。一时群贤毕至，冠盖云集，盛况空前。

这次讨论会的中心议题是百年来中美经济关系。环绕这个主题，来自全国各方面的学者带来了他们长期研究的成果。有的驳成说立己见；有的开拓了新的研究空间；有的探颐索隐，发现了新材料。各篇论文内容丰富，精彩纷呈。本书就是这次学术讨论会的成果。

细心的读者会发现本书有以下的一些特点：第一，时间跨度很大。学者们观察的视野从美国独立战争后东海岸商人的航海贸易一直延伸到今天 Wal Mart 在深圳的活动。在这一跨度内，一些有代表性的历史课题，基本都扫描到了。第二，内容涉及面很广。属于经济方面的贸易、投资、美援等等自不必说了，值得注意的是上层建筑的文化、教育也被纳入考察的范围之内。在中美关系史中，文化教育的交流本来就是伴随着经济关系的交往而来，而且始终相伴，从未分离。把两者结合起来研究，是在这一领域内跨学科研究的尝试。第三，有相当的深度。有些论文在丰富材料的基础上，剖毫析厘，辨明了是非；有些论文对政治与经济纠缠在一起的历史事件，探索递嬗的轨迹，层层分析，终于使历史还原了本来的面目。还有一些论文以缜密的考订，周详的分析，对学术界长期接受的说法提出了质疑。至于会议期间就材料与观点的反复辩驳不仅给会议带来生气而且把讨论引向深入。更可喜的是本书的作者大多是中青年学者。正是“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中美关系

史研究会很高兴地看到这一批新生力量的崛起。

可以说,本书在我国中美关系史的研究进程中立下了一个耀眼的标记。

明年此时“春风又绿江南岸”,我们期待着石头城下的盛会!

汪 熙

1997年7月于复旦校园

目 录

美国对华关系中的经济因素:历史的考察	1
中美贸易的历史、现状和前景	11
民国北京政府时期中美贸易关系述评	22
禁运与反禁运:50年代中美关系中的一场严重斗争	40
70年代的中美贸易与香港的作用	63
为中美经贸发展创造稳定的环境 ——美国应向中国提供永久性最惠国待遇	80
美国公司对华投资一百年	89
美国对旧中国的投资	102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美国对华借款	122
近代美国在沪企业述论	146
美国非银行金融机构与中国对外开放 ——浅析美国投资银行在中国境外直接筹资中的 作用	163
90年代影响中美经贸关系正常发展的主要问题和对策 研究	173
中国与“门户开放”政策(1899—1911年)	189
塔夫脱政府在华“金元外交”评析	212
中美关于粤汉路权交涉与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	233

“约开”还是“自开”？

——1903 年中美商约关于开放口岸问题 253

30 年代白银问题与中美关系 264

1941 年美日谈判美国草案中有无停止援华条款

——兼述美方两个提案的演变 293

美援“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在台湾的活动 307

民初中国实业界赴美的一次经济活动

——中国与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 323

Wal-Mart 与深圳商业发展 345

中国近代工商业社会形成中的美国在华教会高等教育 353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与洛克菲勒基金会 378

好莱坞的沉浮——民国年间美国电影在华市场研究 389

美国对华关系中的经济因素： 历史的考察

胡礼忠 金光耀

一个国家的对外关系受制于诸多因素，这些因素包括国内政治、国家安全、国际均势、全球战略、经济利益、意识形态、文化传统等。在这些因素的互动过程中，经济利益无疑是必须着力考察的因素。在通常情况下，经济因素既是国与国关系的基础，又是一国外交政策追求的目标。它在相当程度上制约着上述其他因素，甚至主导着这些因素；但有时也会受制于这些因素，甚至从属于这些因素。本文以两个世纪来美国的对华关系为对象，考察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经济因素在这之中所起的作用。

在欧洲殖民者用强力改变了太平洋东西两岸的历史进程之后，隔洋相对的北美与中国之间，便以扭曲了的形态建立起近代联系。促成这一联系的中介是以东印度公司为主体的英国商人，纽带则是中国的茶叶、丝绸、瓷器和北美的人参、水獭皮、银元。由此产生了一个似乎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实：中国的茶叶引发了北美的独立战争，进而催生了美利坚合众国。

美国立国之初，国内百废待兴，国外孤立无援，与英属西印度

群岛、欧洲大陆以及地中海沿岸传统的对外经济交往渠道受到严重阻碍。独立初期执美国政坛牛耳的北部商业资本集团在陷入“没有资源，没有资本，没有商业，没有朋友”的困境后，很快将目光投向了太平洋彼岸的中国。于是，美国与中国之间的直接交往便随着“中国皇后号”的首航中国而拉开了帷幕。时距美国独立战争结束仅仅5个月。

“中国皇后号”的首航成功，在美国社会着实引发了一阵以前往中国追逐财富为主要内容的不小的“中国热”。这股热潮的直接结果是产生了三项中美关系中至今仍未被打破的记录：到1790年，从中国进口的货物在美国全部进口货物中占据1/7；到1792年，美国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地位已仅次于英国而居于第二位；到1803年，美国对华贸易的总值已超过了欧洲大陆国家对华贸易的总和。与此同时，对华贸易的高额利润还孕育了美国第一代巨富。

与对中国商品的需求不断增长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刚刚走上独立发展道路并处于资本原始积累阶段的美国却拿不出什么农产品和制造品来与中国交换。于是，物色运往广州的货物成了长期困扰美国人的一大难题。从新英格兰山林中采集的野生人参，在美洲西北海岸换取的水獭皮，以及夏威夷群岛盛产的檀香木，先后成了美国商人追逐的目标。在这一切努力仍然未能改变美国对华贸易的人超地位时，美国商人便开始步英国后尘，加入了罪恶的对华鸦片贸易的行列。

在早期美国对华关系中，经济因素无疑既是促进中美交往的原动力，又是联结两国关系的唯一纽带。

二

当罪恶的鸦片贸易受到禁止时，美国商人也如同英国商人一样，开始寻求美国政府的炮舰支持和条约保障。然而，对于美国政

府来说,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决定它对华政策的与其说是中国因素,不如说是中国以外的因素,因为它实在没有更多的精力顾及中国问题。

首先,制约美国政府对华关系的是国内因素。当英国发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美国正迎来它历史上“暴风雨般的四十年代”;而当英法联手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时,美国国内的南北战争已呈剑拔弩张之势;在进入南部重建、西部开发和全面工业化的年代后,盛行于美国的“大陆主义”以及巨大的经济机会又诱使许多长期致力于对华贸易的美国商人从中国脱身,转而投向国内的经济建设。与此同时,受“淘金热”诱惑络绎不绝奔赴美国的华人,在美国人眼中成了负担和累赘,美国对他们实行了残酷的门户关闭。

其次,美国对华关系又不能不受到美国对外关系全局的左右。19世纪中叶美国外交的重点是大陆扩张,实现称雄北美大陆的图谋;已经成为美国外交基本原则的“门罗主义”则强调新世界与旧世界的分离,着眼于将南美纳入美国的势力范围;而美国立国以来奉行的“孤立主义”又力图避免卷入外国事务。因此,在完成对北美大陆的兼并和南美的控制以前,向远东扩张还无法列入美国外交决策层的时间表。

再者,美国的对华关系要受制于美国本身的国力。1860年,美国工业生产总值在资本主义世界中落后于英、法、德三国而占据第四位。它尚无力大规模经营大洋彼岸的中国事务。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只能在“利益均沾”的口号下与其他列强分享在华特权,并尽力防止其他列强变各国均沾为一国独占。由此产生了19世纪60年代美国在华倡导的“合作政策”。

在19世纪中、后期,无论是与其他列强相比较,还是与美国对华关系中的其他因素相比较,经济因素在美国对华关系中并不占据主导地位,或者说不是起支配作用的因素。

三

1895 年中日甲午战争打破了列强在华原有的均势,从而激起列强瓜分中国的新一轮竞争。当远东国际政治格局发生剧烈变化之时,美国国内经济正迅速发展,并成为世界上经济实力最强的工业化国家。与此同时,美国在美洲大陆的“西进”已走到尽头,但却在太平洋上占据了夏威夷、关岛、菲律宾,经济实力的增长和国内“边疆”的消失,引起了对海外市场的追求。

19 世纪末,美国在中国的经济利益仍不很大。虽然 19 世纪的最后 10 年是美国对华贸易在经历了停滞萎缩后的增长时期,美国的对华出口额从 1890 年的约 300 万美元激增至 1900 年的约 1500 万美元,但在美国出口总额中仍只占 1.1%。这一时期美国在华投资同样有明显的发展,至 1902 年达到约 1900 万美元,但也仅占美国海外投资总额的 1.2%。

促使美国在追求海外市场中将目光投向中国的是美国人心目中潜在的经济利益。刚经历了 1893 年经济危机的美国资本家认为,摆脱危机的唯一办法就是向海外大规模地输出剩余商品和资本。因此,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中国对他们具有巨大的诱惑力。在他们看来,可以在比美国人口高出四倍的中国找到销售剩余产品的市场。这一看法对美国的外交决策产生了影响,驻华公使康格坦言,他是“以商业而不是以政治作为其外交指导方针的”。

在这种情况下,列强在华划分势力范围,实行排他性的经济政策,对美国来说,就意味着失去他们期望中的中国市场。这就是约翰·海提出“门户开放”政策的根本动因,即追求美国在华现实的和潜在的经济利益。在成为世界第一工业大国后,经济利益推动美国确立了独立的对华政策。

20 世纪初,美国在华经济利益主要集中在中国的东北地区。

由于先是俄国后是日本势力在这一地区的扩张损害或威胁了美国的经济利益,美国当时远东政策的主要目标就是对付俄、日的扩张。塔夫脱政府上台后,更是以华尔街的利益为出发点,明确表示“外交为贸易服务”,积极推行“金元外交”。旨在控制东北铁路的“诺克斯计划”不仅是企图扩张美国经济势力的产物,也是以美国的经济实力为武器力图增加在华政治影响的典型。

威尔逊虽是一位高举“理想主义”旗帜的总统,上台伊始就退出了国际银行团,似乎在对华政策中更注重道德因素,但当日本在华势力日益扩张之时,他和他的前任一样急切地关注着如何维护和扩大美国在华经济利益,并也企图以经济为武器牵制日本在华的扩张。但是,威尔逊对国际联盟的迷恋,不仅无法阻止日本在华的扩张,也最终损害了美国在华经济利益。

在 20 世纪初的美国对华关系中经济因素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既是美国门户开放政策追求的目标,又是推行这一政策的主要手段。

四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在中国获得的权益经过巴黎和会得到了列强的确认,但在这之后美国通过华盛顿会议抑制了日本在华进一步扩张的势头,重新协调了列强在中国和整个远东的新的均势,从而确立了由美国倡导的华盛顿体系。华盛顿体系的核心是维持列强间的均势。因此,整个 20 年代当这一体系在远东国际关系格局中占主导地位时,美国对华关系中经济因素就让位于国际均势这一因素,其作用不如前一时期那么突出。

20 年代也是五四运动后中国民族主义日益高涨的时期,中国人民废约斗争的目标直指列强在华特权,包括美国在华享有的经济特权。面对中国人民的废约呼声,有直接经济利益的美国在华工

商界要求政府采取强硬的对策，与列强联手对华进行干涉。然而，美国政府并没有据此制定它的对华政策。有限的经济利益使美国在华工商界无足够的力量去影响华盛顿。

九一八事变打破了列强在远东的相对均势，美国对此的最初反应是继续尽力维持这一均势。但面对日本不断升级的侵华行为，罗斯福执政初期的美国政府显得无能为力。不仅如此，美国国内的经济因素（白银法案）此时也介入远东的国际关系，反而助长了日本对中国的侵略。

这一时期美国在日本的经济利益大于美国在中国的经济利益，这通常被认为是美国对日示弱的主要原因。但实际上，对这一时期美国远东政策具有决定意义的是均势而不是经济因素，因此上述观点没有正确把握经济因素在这一时期的作用。

七七事变后美国政府逐步认识到日本的继续侵华不仅意味着远东国际关系中原有均势的破坏，而且意味着最终将导致美日在太平洋上的冲突，于是它的远东政策开始发生具有实质性意义的变化，朝着援华制日的方向艰难地迈出了第一步。在这一政策调整中，经济因素虽不是动因，但成为实现政策目标的主要手段。它的作用是两方面的：通过对华提供贷款增强中国的抗战能力；通过废除《美日商约》和有限禁运遏制日本的侵略势头。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经济因素成了联结已成为反法西斯同盟国的美国和中国的重要纽带。美国通过加强援华，增强中国的抗战能力，牵制日本在中国的军事力量，以实施其先欧后亚的既定战略，同时也加强美国在华的影响。而另一方面，中国政府也是以美国援华物资的数量来衡量美国支持中国的程度。

经济因素在这一时期虽是从属性的因素，但却仍是美国推行其对华政策的重要手段。

五

第二次世界大战使美国的力量得到空前的膨胀。战后，美国在太平洋上的主要竞争对手日本被击败了，在远东有传统势力的英国衰落了。半个世纪来美国在中国追求的门户开放已没有任何对手和阻力了。因此，它不仅要使中国的门户全部开放，而且企图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独占全部中国市场。《中美商约》集中体现了此时美国对华政策中对经济利益的追求。由于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总的来说是一个对美友好、顺从的政府，又由于美国本身所具有的经济实力，美国向往已久的“中国市场梦”在战后初期几乎已经全盘实现了。

但是，中国革命的胜利使美国对中国市场的独占如昙花一现，很快就成为一枕黄粱。而战后国际形势的急剧变化则使得经济因素在美国对华政策中的作用又发生了变化。

二战后，美国确立了称霸全球的战略目标，这一战略目标与苏联对国际格局的构想形成了鲜明的对立，从而引发了一场冷战。在美苏对峙的格局下，美国的对华政策必须服从于它的全球战略，这也就意味着要受制于它的对苏政策，于是经济因素让位于全球战略这一更为重要的因素。

与二战后初期迫使中国全方位向美国开放相反，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在中国实行的是被毛泽东称之为“门户封锁”的做法。封锁、禁运等经济手段成为美国推行敌视新中国政策的重要武器。由于美国实行的“门户封锁”，中美之间的双边关系包括经济交往在五六十年代基本断绝。

六

如果说苏联因素或曰全球战略因素是导致 40 年代末中美对峙的原因之一,那么到了 70 年代初苏联因素却又成了促使美国与中国接近的主因。但即使如此,经济因素在中美关系解冻时也绝非无足轻重。

一个往往有意无意为人们忽视的事实是,正是从 1971 年起,美国丧失了已保持了 80 多年的国际贸易顺差地位,而美国经济也陷入了滞胀的困境。尼克松政府在宣布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同时,着手进行以战略收缩为主要特征的全球战略大调整,这两者之间的联系是发人深省的。为了对付苏联的威胁而改善对华关系是美国全球战略调整的主要内容,而美国谋求对华关系解冻的信号首先是由放宽对华旅游和贸易的限制而发出的。此后一次次宣布放宽对华贸易限制,并提高中国在美国出口贸易中的级别,则成了基辛格秘密访华之前和尼克松公开访华之前,美国精心选择的送给中国的见面礼。这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同样耐人寻味。

或许美国政界在着手改善对华关系时更多考虑的是全球战略因素,而对于美国工商界来说,支持政府改善对华关系的首要着眼点绝对是中国市场的无限诱惑力。而当美国在华商业利益因为两国关系迟迟未能正常化而受到影响时,经济因素又成了美国决心实行对华关系正常化的推动力和催化剂。在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进程中,经济因素相对于战略因素,在美国对华关系全局中尚是一个从属性的因素,但绝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物和意料之外的副产品。中美经济关系中蕴藏着的巨大能量一经释放,便显示出了不可抗拒的生命力。正是在美国决定与中国建交的 1978 年,两国贸易突破历史上的最高水平,即抗战结束后的 5.58 亿美元,猛增至 9.91 亿美元。

经济因素实际上也是观察美国对华关系的晴雨表。在两国关系解冻后的 20 年间,美国对华政策和中美关系经历了三起三落,与此相对应的是,中美经济关系也出现了三次起落。

表 1 中国对美进出口统计

年份	总额(亿美元)	出口	进口
1974	4.75	1.02	3.72
1975	4.70	1.28	<u>3.41</u>
1976	3.16	1.56	<u>1.60</u>
1977	2.94	1.79	<u>1.14</u>
1978	9.91	2.70	7.21
1981	58.88	15.05	43.8
1982	53.37	16.20	<u>37.16</u>
1983	40.27	17.05	<u>23.21</u>
1984	59.63	22.99	36.63
1989	122.5	43.9	78.6
1990	117.5	51.8	<u>65.9</u>
1991	142.0	61.9	80.1

如果对这三次起落进行分析,我们似乎可以得出中美经济关系受政治因素制约和左右的结论。但这绝非全部答案。表 1 提供的事实起码还可以使我们得到以下几点启示:

第一,自 1971 年中美经济交往恢复以来,中国对美出口始终处于稳步上升的态势,起落不定的是美国对华出口。第二,美国对华出口尽管出现起落,但总体上呈现的是波浪式上升的势头。一遇风浪会受压制,而一旦风浪平息便又上了一个新台阶,而且上升幅度之快不仅在双边贸易史上,就是在各自的对外贸易史上都是不多见的。第三,三次起落的间歇期一次比一次缩短。第一次经历了 1975 至 1977 三年落差,第二次时间跨度为两年,第三次则为一。第三次风浪以后,尽管两国政治关系依然时而急转直下,时而峰回路转,甚至一度跌落到建交以来的最低点,两国经济交往却不但没再呈现相似的起落,相反保持了持续增长、直线上升的势头。

不但如此,经济因素在相当程度上还成了两国关系的粘合剂和稳定器。

对上述三种现象的最好解释,与其说是经济以外的因素在左右着两国的经济关系,不如说是经济因素在美国对华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出现了深刻的变化。

如果我们对于影响美国对华关系的诸多因素进行综合考察的话,我们不难发现,在两国关系解冻之时和建交初期,左右美国对华关系的主要是美苏中大三角这一战略因素,自1983年起开始演变成国际战略、地缘利益(东亚)和经济联系这三大支柱,冷战结束后尤其是克林顿执政以来又演变为经济、安全、民主这三大支柱。经济因素在70年代以来的美国对华关系中经历了从从属于国际战略到与战略利益、地缘利益并驾齐驱,再到成为联系两国关系的主要纽带和基石这样一个演变过程。主导这一演变进程并非经济以外的其他因素,而是经济自身所具有的不可抗拒的规律性。

从“中国皇后号”首航广州至今,中美两国的交往已走过了二百多年的历程。经济因素在推动中美开始交往后,它在美国对华关系的发展中划下了一条起伏不定的曲线,如今似乎回到了原先的起点,但这显然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走向了一个更高的层次。尽管目前中美两国经济发展的程度和态势存在着差异,经济合作的水平与两国的国际地位还很不相称,在经济交往的一些领域也不乏摩擦和纠葛,但两国在经济上存在着很大的互补性、广阔的合作领域和巨大的发展潜力已是不争的事实;加强和发展两国的经济往来已成为两国的根本利益所在和两国共同的内在需求;两国在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关系已日益加深甚至达到非经济因素难以使其逆转的程度。在冷战后时代以经济为中心的综合国力竞争中,发展经济已成为中美两国内政外交的首要目标,经济因素因此也势必成为维系两国关系的主要纽带和发展两国关系的巨大动力。